

## 學術論文

# 中國改革時代的媒體與輿論

---

##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Reform Era

*Tilak Jha*

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本研究主要探討媒體政治控制的權力下放至區域與地區性參與者，以及政府與市場的經濟控制的關係。其假設中國媒體有一種微妙的特質，媒體即使服從政府的審查，仍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揭露人民的各種意見。當尚未通過政黨不同階段控制查核的消息被揭露，即便政黨很少遏止與其統治合法性不相關的事情，淡然比以往更不願意在社會，甚至維護在中國各地明顯的抗議的壓迫下改變其憲法與特質。其認為政黨的崛起受到輿論對近來許多國內政策議題的直接影響。然而有一個悖論很難被忽視—看似矛盾的媒體目標，包含最近的一個挑戰—香港雨傘革命。

The study looks into decentralisation of media's political control among regional and local stakeholders, and economic control amid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It posit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has subtly, often unconsciously, even while obeying the Chinese censors, exposed people to a variety of opinion. While

what comes out in the media yet goes under the scanner of the party's media control at various stages, the party though rarely restrains itself from curbing anything distantly related to its legitimacy, it has become more reluctant than ever to force itself upon a society that is fast changing its constitution and character, even asserting as evident in the many protests across China.

It argues that Party's rising concern to account for public opinion has of late had direct impact on many a domestic policy matters. Nevertheless, the paradox is hard to miss amid a whole lot of seemingly conflicting media goals – the latest one being the challenge to contain Hong Kong's Umbrella Revolution.

---

**關鍵字：**中國媒體與官僚化、組織與宣傳、公共領域、公共意見、  
中國改革時期

**Keywords :** Bureaucratization and Media in China, Organization and  
Propaganda, Public Sphere, Public Opinion, Reform Era China

## 壹、前言

組織與宣傳歷來被中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應用，導致黨國體制不斷侵入「群眾」(public)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空間，也就是媒體與輿論的心臟與靈魂。即使是在演變為社群媒體時代的今天，其仍然持續應用，除此之外，黨的宣傳透過加強新媒體平台的採用取代傳統媒體平台以形塑輿論。中共在 1949 年成為一黨專政國家之後，從 1978 年起較顯著的改革時代—後文革動盪中，組織被忠於黨的官僚化設計取代。在這個時期，中共不再使用傳統的宣傳方式，但要塑造群眾的思想仍因太過無聊與世俗而有不足。從蘇聯的解體，中國記取宣傳推動的事務與輿論脫節的教訓，因此中國的宣傳機制的重點逐漸轉移到適應與影響輿論，其在不同的程度上取決於問題的情況與敏感性，並尋求透過媒體重新為公共領導的宣傳進行定位—包含群眾與商業。理論上來說，改革時代媒體與輿論發展的範圍大致可以透過四項基本原則（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CP）進行解釋。這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在社會政治與經濟改革的指導框架下維護黨的最高地位，其中快速的經濟重建被解釋為對缺乏相對的社會政治改革，包含無限制的輿論的補償。

然而，在經濟蓬勃發展的改革時代，市場扮演的角色更為吃重，同時企業家也影響了過去作為黨的宣傳機制的延伸的媒體的運作。其後媒體更發展為一個透過廣告產生收入的行業，並在避免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的情況下，提供服務給作為消費者的讀者及聽眾。即便不斷的增加包含媒體在內的私營部門參與中國的經濟復甦，黨對於媒體的存在仍然採不友善的壓迫態度，並期望創造聽眾。在天安門事件中，隨著群眾對媒體的角色的期待升高，中國的政治首長們曾在保持媒體審判、媒體宣傳的趨勢上取得極大的成功，並控制著引起轟動的政治問題。事實上，不同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宣傳方式，他們經常透過訴諸於民族主義與中國的驕傲，更廣泛的影

響民意。然而在需要的時後，他們很少克制使用的手段，包括直接與間接的審查，甚至逮捕和拘留任何發表打破集體化的敏感言論的相關人士。

總體而言，在瞬息萬變的社會動態中，中國的黨國體制不斷地試圖影響與控制群眾與公共領域。接下來本文以什麼是中國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其作為全部的群眾與公共領域為討論核心，接下來依序是媒體與輿論的存在。

## 貳、中國的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

「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概念在西方的背景與論點下其來有自，但若應用在中國的社會與政治上，則常被解釋為缺乏對中國的了解。幾乎所有西方「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結構的核心對於國家與社會皆有所區分。主要的理論，像是哈伯瑪斯（Habermas）、托克維爾（Tocqueville），甚至是提供靈感給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Marx）都同意國家與社會間的區分。哈伯瑪斯與馬克思相信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出現可以歸因於中產階級的出現—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最小的階級主要是農村。<sup>1</sup>

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市民社會的多元化制度由一個理性規劃的國家取代。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是中產階級剝削勞動者的場域，中國是中共理性規劃下的計畫性國家，其中佃農與地主的關係被解釋為剝削，但是在中國的黨國制度文化與本能中，多元化制度原本就不存在，即便是在後改革時代，當中國放寬勞工等同被剝削的定義，市民社會的機構仍不敢過度對抗國家。以這個面向來說，中國更接近黑格爾哲學（Hegelian）的市民社會，相較於高位的國家，社會的空間較小。黑格爾承認市民社會和多元的社會制度是獨立且不與國家形式相連。然而財產私有化是黑格爾市民社會的重要特徵—一種中國居民只在 1978 年改革對城市部分開放私有

---

<sup>1</sup> Paul Healy, "Misreading Mao: On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38, No.4 (2008), p.538.

化後開始取得的權利，因此在中國財產私有化仍尚未成熟。與馬克思及黑格爾不同，托克維爾的市民社會制度立基於信任與不遭受政治社會對待—政府與權力關係處理制度。根據托克維爾的理論，政治與市民社會在民主國家中是相互支持的兩造，因而無法應用於中國。<sup>2</sup>

在中國的情況下，國家戰勝了理智甚至是文化制度來指導社會，所以與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假設公民處理議題時「不成為被脅迫的主角」的概念截然不同。<sup>3</sup>在文化方面，中國人民基於歷史的影響，對於社會採取義務與相互依賴而非權力與責任態度。<sup>4</sup>

除了定義，最終仍需歸結到市民社會所採取的功能。雖然不完全同意，但 Guo Gang 大致確認了市民社會的三大功能：經濟、民主與穩定。<sup>5</sup>Mary B. Rankin 追溯中國最早期的市民社會及「中國公共領域」出現，是在由地方菁英主導的非官僚方面的地方事務的公共管理，最早出現在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期。<sup>6</sup>明末對於公共領域開始有限度的實踐，在清初，即便相對受到較高的官方監督，公共領域仍持續擴張。然而這些都還是一個受到國家管理的公共領域，即便國家的角色與管理幾乎不存在的時期，中央仍不會開放公眾討論的空間。William T. Rowe 指出一些歐洲式市民社會出現的社會經濟的必要制度，也曾在於中國清朝的部分地區出現，其包含公眾參與競技與發展活動、民法、物權、出版業與消費者導向的市場。<sup>7</sup>Rowe 的

<sup>2</sup> Boris DeWeil,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From Greek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Marx," *Past Imperfect*, Vol.6 (1997), pp.3-42.

<sup>3</sup> Jurgen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in Chandra Mukerji and Michael Schudson eds.,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398- 404.

<sup>4</sup> Frederick Wakema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 China*, Vol.19, No.2 (1993), p.134.

<sup>5</sup> Guo Gang, "Civil Society: Definitions, Causes, and Functions," <http://home.olemiss.edu/~gg/paperhtm/civilsoct.htm>

<sup>6</sup> Gu Xin, "A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in Post-Mao China? An Overview of Western Publications," *China Information*, Vol.8, No.38 (1993) p.44-45.

<sup>7</sup> William T.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6, No.3 (1990)

論點是以 Frederick Wakeman 在 1991 年的作品為基礎進行延伸，因而被批評有許多基礎論點的經驗性證據不足。然而在 19 世紀中葉，公共領域的發展因太平天國與義和團起義的影響受到限制。

二十世紀初期，清末民初的年代中—當時中國積極的談論人民的權力，甚至是西式的民主。中國的公共領域主要體現在「在地方層級無國家活動促進公共財對服務與資源的提供」，而非自由表達意見。在 20 世紀初期，薄弱的國家政府也阻礙了民間機構的出現，不斷的政治動盪、日本侵略與群眾示威運動的增加都無助於深化新生體制的變革。在中國共產黨贏得政權後，毛派的手段與方法顯著的影響中國人的生活，即便在普遍的觀點中認為人們的生活更進一步地被國家侵犯並收回他們對抗國家的力量，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體系幾乎摧毀所有的自主活動。

在毛澤東專制主義的時期之後，鄧小平在 1979 年的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其迎來一個改革的時代，不僅放寬了黨國在生活每一個面向的控制，更推動了促進獨立的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制度變革。隨著人們的訴求增加，強烈要求依循法律規則、司法獨立、重新制憲，黨的領導階層受到危機的環繞，這同時意味著自主的社會政治制度是一個從中國共產黨保守派影響力中獨立的廣闊空間。在 1989 年天安門事變中，其持續升高，並成為奠定輿論的基礎力量。<sup>8</sup>事實上，1978 年之後的中國看到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繁榮與弱化黨國廣泛的影響力。這些開始成為公共領域活躍的開端，即使中國仍受到黨國體系的控制，國際媒體與新興的機構在發展中國的公共領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學生、工人與知識份子因此自主性的連結，但在國家強力遏止下，無法有更成熟的發展。<sup>9</sup>

總體而言，自 1978 年以來，快速的增長成為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擔保，即使真正的自治仍有困難，他們透過擴展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依存關

---

pp.306-329.

<sup>8</sup> Gu, *op. cit.*, pp.42-52.

<sup>9</sup>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2), p.21.

係，彼此間維持既競爭又共謀反抗的型態。<sup>10</sup>市民社會在中國並非如加拿大政治思想家查爾斯泰勒所言，是最小或最強的種類，現代的中國市民社會也不完全具備市民社會的三大元素<sup>11</sup>—至少不是全部自治，如 Boris DeWiel 所書。<sup>12</sup>顧昕指出另一個市民社會在中國的背景更偏向於由黨的群眾意識轉向「公民意識」(citizen consciousness) 的限制。<sup>13</sup>

### 參、國家—社會關係與全國民眾

在歐洲，儘管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擴及平民，每天的報刊輿論大多數是由中產階級擁有以代表「公民社會」的利益與政府進行抗爭，並逐漸演變為我們目前所知的媒體和輿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反審查規範擴張了公民自由權。在中國，媒體的發展是政治動亂與國家權力追求者的意識型態下的犧牲品，幾乎沒有任何人試圖逃離特權階級控制下的社會言論，這是自帝制以來的趨勢，而那些統治者包含被 Maurice Meisner 稱為末代皇帝的毛澤東—透過用社會壓迫自我觀點，因此這個國家幾乎不曾處於正常狀況下。Hyunyi Cho 指出，在中國的傳統上，輿論可以被認為是個人被培養的時候的「整體的關係」，因此社會需要受到控制。<sup>14</sup>在 1978 年改革後期，因為認識到輿論的重要性，第一次試圖提供報章輿論更大的空間，在政黨之中支持群眾輿論具有一定角色的聲音也開始崛起。或許最明顯接受獨立的

<sup>10</sup>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121-141.

<sup>11</sup> DeWeil 強調自治權、相互依賴與多元制度是社會的三大元素。

<sup>12</sup> Boris DeWiel,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From Greek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Marx," *Past Imperfect*, Vol.6 (1997), pp.3-42.

<sup>13</sup> Gu, *op. cit.*, pp.38-52.

<sup>14</sup> Hyunyi Cho, "Public Opinion as Personal Cultivation: A Normative Notion and a Source of Social Control in Tradition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12, No.3 (2000), p.300.

輿論是在 198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中，總書記趙紫陽呼籲黨作為「監督的角色」。然而因為 1989 年的天安門事變發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群很快地恢復限制媒體的相關政策。

在上個世紀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經歷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位，並且需要從社會與國家兩個面向來做了解。Huang 認為不同於西方「國家與社會關係是二元對立」的模式，<sup>15</sup>這裡存在「三重概念—有一個第三空間在國家與社會之中，並且都是參與者」，他稱其為「第三領域」—一個涵蓋政府與法院，特別是民法司法體系、農村行政單位，甚至是一般社會文化的空間，其被黨的組織與宣傳佔據。第三領域包含媒體，儘管離自主的制度化尚有由遠的距離，但在中共的規則下仍有顯著的發展。

在改革時代的中國，對於國家與社會關係進一步的重置。因此，「命令」轉為「指導」，並且村和鄉鎮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性。第三領域的制度實質上是一套持續變化的規則，根據 Huang 的論述，在中國這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政治變革，帶來了一個「國家強制將社會的組織切割為最小行政區/隊和工作單位」，並阻止其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公共」。無疑的這樣的社會政治形式的改變保證了強而有力的物質發展與高度發達的行政機構，但並不像全國公共。

在經濟改革之後，中國群眾相互影響與成長。現今隨著社群媒體的到來，在近幾年間，第三領域雖然沒有明顯的強化，但仍受到一定的壓力。

#### 肆、自治與輿論

中國的媒體與公共領域共享了一個複雜的關係。直到 1980 年代，媒體仍扮演黨國喉舌的角色。某方面來說，我們稱呼為輿論是具有誤導性的—絕大多數的社會，像是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是描繪自一個非民主國家

---

<sup>15</sup>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Vol.19, No.2 (1993), pp.216-240.



之下複雜的歷史與當代因素的影響，當他們相信這會在公共領域成為流行時，人們會在群眾之中分享他們的私人意見，反之亦然。<sup>16</sup>Hyunyi Cho 認為輿論也構成了「沈默的意見、缺乏意願、冷漠、無為與信任政府的道德權威」。<sup>17</sup>有鑒於中國的背景，很難想像沒有一個真實自治的社會卻可能有媒體自治。在文化大革命與 1989 年天安門事變的祭壇上，它更因此對於「公共自治」在中國公共領域出現有所阻礙。中國的媒體政策首重防止群眾從地區性的自治轉變成全國性，大多數的城市與省都以報紙與電視節目作為基礎，較少對無法超越區域範圍的平台進行控制。

最近，中國群眾已經能夠透過社群媒體擴展至全國。在這裡，黨國透過部署數以千計的網路警察與精密的科技，已經成功的避免超過一個議題建立持續的連結。任何群眾集體化的趨勢在線上領域是反擊的第一線，然後透過服務黨的組織、警察和軍隊強制離線。

## 伍、主要的媒體改革

直到改革時代開始，媒體的概念對於中國的群眾仍是陌生的。在毛澤東時代，媒體機構就像其他任何事業單位一樣，各種形式的文化產品都受到中共宣傳部（Propaganda Department, PD）的直接控制。<sup>18</sup>

1980 年代的改革和經濟結構重整與後續十年並不是以媒體為主要目標。在經濟改革的背景下，媒體改革的推動較少有政策上的改變。為了媒體，其在媒體機構中設法重新調整他們早期的標準，並轉為企業管理和商業廣告，並在中共宣傳部之下繼續開展其政治文化責任，同時試圖將其對

---

<sup>16</sup> E.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4, No.2 (1974), pp.43-51.

<sup>17</sup> Cho, *op. cit.*, p.301.

<sup>18</sup> Liu Qing and Barrett McCormic,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Vol.38, No.1 (2011), pp.101-134.

國家補貼的依賴在不牟取暴利的情況下減至零。<sup>19</sup>然而，黨國的財政問題和商業化媒體的高收益，在快速成長的消費市場，保證了媒體改革的發生。在相同的精神下，新聞出版總署（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shing, GAPP）在 1978 年重建時尋求規範性的媒體管理取代意識形態，用新聞的行話來說，就是媒體的法律需求與媒體專業素養。

1989 年底江澤民總書記上任，暫時恢復媒體做為喉舌的角色，媒體改革的下一輪，即使很大程度的是裝飾性的，隨著鄧小平著名的 1992 年的南巡。在中國宣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 年 10 月，第 14 屆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中，報紙成為一種商品與新的組織化事業，並通過市場規則進行調節。大多數的報紙被黨中央機構要求在 1994 年實行財務獨立。

儘管上述的所有發展，就像 Lui 和 McCormic 注意到的，「媒體的商業化並沒有對正式的制度化壟斷有太大的改變，國家凌駕於全部的媒體單位之上，但仍創造了一個新的操作結構，其中媒體仍被放置於國家與市場之間」。<sup>20</sup>有效的媒體改革始終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並存在一個「鬆動與緊縮控制的持續迴圈」之中。整體而言，1980 年代的發展對於媒體工業與媒體語言有根本性的影響，但媒體監督架構仍只有微幅的改變。

### 陸、後媒體改革與宣傳趨勢

宣傳機器在中國後改革時代開始發展，當黨國意識到他需要被群眾記憶與注意，因此生產與宣傳訊息的格式尋求達到商業化的標準與審查經常轉為修改。當直接的控制和和嚴格的審查變得越來越難以執行，自我審查和收入成為威脅的伎倆。

這些情況為一般的媒體帶來深刻地改變，就內容、範圍與性質的面向可以分為下述三種類別：

---

<sup>19</sup>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ocument No.69, 1980.

<sup>20</sup> Liu and McCormic, *op. cit.*, p.108.

(一) 廣告產品和娛樂與流行文化的最低規範形式是重中之重。

(二) 其他主要的位置受到黨的激勵宣傳在討論與新聞的形式。黨尚未保證違背限制的媒體產品，將不會被觀眾搜尋到。

(三) 其他知識產權的主題得到留下的邊際空間。

這三種重要的形式所帶來的多樣性是難以想像的，直到改革時代。雖然黨持續提升其優勢及其具有神聖及公平性的道德權威，媒體在整體上仍有所擴張。然而，出自知識份子階級的真相，多來自隱含的不明顯的寓言與關鍵性的民主辯論。

媒體目前被允許一定程度的自主，在包裝的好的情況下，無害的政治批判與格式受到歡迎。大眾媒體，雖然大多數由消費導向、觀眾賞心悅目的娛樂所構成。Wenfang Tang 指出，在群眾的政治態度上，有效的媒體控制在市場化的推動下是非常複雜的，中國的報紙、廣播及電視透過打破體制的壁壘與控制吸引觀眾收看。<sup>21</sup>儘管所有的政治壓力，在商業化的媒體已經創造一些空間給另一種想法與觀點，甚至在政治性議題上有批判與理性的辯論。連續的媒體曝光也是一項審查的關鍵。黨的主張透過測試已證明其政策是有問題且被批判的，甚至超過以往的任何時後。然而，黨已經走向智能化、移動的方式與意識形態的內容，以適應日益商業化的媒體環境文化。官方平台之外的媒體缺乏正式的體系與法律保護，群眾討論的另外一種選擇使黨的制度變的孤立。

黨國認識到不能沒有輿論監督和輿論導向的指導。人們也認識到，沒有對政府績效的批評，在國家控制下的媒體很難建立公信力與威信。因此，有一個明確的聚焦在議題設定上，從意識形態的規勸轉移至「關注發起與認知的創立。」其主要目的在用「一個間接的、彈性的、巧妙的方式

---

<sup>21</sup> Wenfang Ta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79-100.

引導輿論」，與考慮下的三件事情：「團結、穩定與骨氣」。<sup>22</sup>這樣的擔憂也反映在黨的其他組織。中央黨校在 2008 年發佈〈緊急加強領導核心應對媒體之能力〉的文件。這種轉變被稱為公共管理而非過去的單一行政管理。各方面都要著重在處理媒體的部分，包含取得媒體的優勢與友善地對待媒體。他也因此被稱為政府新聞工作：一個跨越公共關係與新聞的學科。

James Reilly 在其具代表性的著作《強大的社會與聰明的國家：在中國對日政策中輿論的崛起》提到中國政府在面對民粹主義的壓力時，一直奉行「專制主義的回應」。<sup>23</sup>其中包含「包容、響應、說服與鎮壓，彼此互相結合的策略」。Reilly 寫到中國是一個社會自由主義與政治威權並存的獨特個案。在政府系統中他也吸納來自社會的聲音與修訂符合群眾需求的政策。毫無疑問的一個融合軟硬手段的機制，幾乎可以確保群眾的政策需求，很少轉向尋求民主過渡。

### 柒、習近平主席下的媒體與輿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 8 月 19 日的演說中，在意識形態的部分引發政府是否會進行有效的「輿論鬥爭」或是有些人稱為「正面宣傳，輿論鬥爭」的爭論。人民日報 2013 年 8 月 30 日的社論中提到要「有效的引導輿論，積極展開輿論鬥爭。」這樣的解釋是第一次出現在改革時期。人民日報的編者將習近平 2013 年 8 月 19 日演說稱之為〈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的科學指南〉。另一篇由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在 9 月 4 日所撰寫的文章指出注意力轉向一個來自新媒體的挑戰，並稱其為輿論鬥爭的「優先戰場」。在同一天，解放軍報也出現了一篇名為〈奪取網絡輿論鬥爭的主動

---

<sup>22</sup> Alex Chan, "Guiding Public Opinion through Social Agenda-setting: China's Media Policy since the 199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6, No.53 (2007), pp.547-559.

<sup>23</sup> 譯者註，本書書名原文為"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目前尚未有正式的中文翻譯本。

權〉的文章。<sup>24</sup>

在習近平之下這是一個清楚的指標指向比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更具控制性的建制，如果不是回歸到改革前的威權制度時期。當 Gang 指出，在江與胡主政期間，他們採取通過政黨的媒體政策，但是其中一個關心國內與國際的看法。正因如此，中國在過去十年間加強法治。他們明確地遠離「鬥爭」一詞，不像習一樣。習的政策反映形塑輿論與民族主義的主軸，也就是其所謂的「中國夢」更具同質性。

在去年 11 月舉行的第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第十八屆三中全會），討論的核心議題集中在廣泛且深化的改革，透過更多的文化交流與定期的全球溝通增加中國的軟實力。在中國夢的線上，旨在加強與經濟實力相比弱化許多的軟實力。實際上，高效率的宣傳文件被間接地接受，或許在第一時間，政府宣傳不是最有效的宣傳形式，而與非政府組織交流是推動中國軟實力的關鍵。在國內，雖然最近一陣子對網路活動的鎮壓證明了衝突的信號亮起。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指出，非政府部門在文化產業的角色因為媒體的缺席，在走向國際時，中國政府現在更為開放，這是重要的構成。他確實宣布相對的科技條款給媒體，在國內的部分。公告包含制度化的政府訊息發佈系統、現代文化服務體系和反饋機制、擴大國內與國外的文化交流、記者執業資格標準化與透過擴大國內外的文化交流開拓文化市場。儘管三中全會宣稱要「全面深化改革」，其仍呼籲要改善應對「網絡突發事件」的機制。

這個矛盾很難被忽視，特別是當相較於更顯著的提升「對中國社群媒體的廣泛壓迫」，引用自 Minxin Pei，對現任領導廣泛的反貪腐宣傳有著矛盾對立的論點。<sup>25</sup>其試圖透過於侵入性的控制與資訊滲透模式掌控與已經超過一個月的香港雨傘革命的關聯，是另一個例子。中國官方媒體一直努

---

<sup>24</sup> Qian Gang, "Tracking the Course of Media Change in China," <http://cmp.hku.hk/2013/09/24/34085/>

<sup>25</sup> Minxin Pei, "Rumor Has It,"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rumour-has-it/1179235/>

力的嘗試，除了表達對傘人的支持。將其與全面持續支持習近平的中國夢的媒體並列，你將會有很多衝突的媒體複雜性包含在裡面。

中國夢被認為是隱含與美國並列並在全球推動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野心。為了影響國際輿論，中國政府已投入數百萬的資金，從媒體的投資在非洲到相似的突擊在歐洲與美國，為了推動一個對中國有利的、柔軟的形象。其著重加強中國的文化產業，以提升其在全球的軟實力是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的另一個主要的焦點。中國政府預期有效的媒體將從機構轉為企業。

## 捌、結論

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透過一系列的手段，包含政府機構的調查、智庫的報告、宣傳部和情報機構來標籤群眾。他也通過私人訊息的操作與通信器材做到這一點。在香港的持續抗議事件的廣度與延伸不能被搜尋在中國本地是個例外。儘管社群媒體在中國擁有將近六百萬用戶的規模，其宣傳體系在許多方面也有明顯的作用，但不是全部。此外，應用複雜的手段監控一般媒體，社群媒體是特別的，其包含接受政治活動與民眾抗議作為安全閥。不能否認，這些資訊的標準化使用於制訂政策、建立輿論與增加政治優勢。儘管如此，目標的訊息仍然相同—特別是政治性的與那些在群眾眼中的黨國的資源—繼續被視為具有戰略意涵。

（譯者：高佩勳）